

章太炎全集

檢論
尙書
重訂本

尙書
初刻本

章太炎全集

檢論
煊書
重訂本

煊書
初刻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馗书》重订本、检
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朱维铮点校.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148-5

I. ①章… II. ①上… ②朱… III. ①章太炎
(1869~1936)-全集 ②古典哲学-研究-中国 ③政论-中国
-民国 IV. ①B259.2 ②B25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1624 号

封面题字 沙孟海
特约编审 金文明
责任编辑 樓嵐嵐 齊書深
封面设计 甘曉培

章太炎全集

《馗書》初刻本 《馗書》重訂本 檢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編

朱維錚 點校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21.5 插頁 5 字數 439,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148-5/K. 2170

定價 118.00 圓

序

世論太炎先生，曰“有學問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無論何者爲確，謂太炎先生之於近代中國爲鮮有之關鍵人物，當無異議。

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以慕顧亭林之爲人，遂改名絳，別號太炎，後竟以號行。先生生於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逝於中華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

先生生當季世，內政隳頹，外侮日深。先生幼承庭訓，讀《東華錄》，民族主義思想萌焉；博涉經史，不自外於時勢，乃漸有救國之志。初則主改良，入“強學會”，撰述於《時務報》，與康、梁爲同道；庚子，斷髮割辮，與清廷決絕，既而重訂《虜書》，作《客帝匡謬》、《分鎮匡謬》，一掃尊清之迷思，耑以“光復舊物”排滿革命爲的矣。嗣後宣揚革命思想，累遭捕繫而不殆。時國人思變，而康氏撰文累牘，以爲民主不可行，力倡君主立憲之說。先生以爲大繆，奮筆痛駁保皇之非，斥皇帝小丑不辨

菽麥，頌民主革命求索自由。時鄒容著《革命軍》，先生序而廣之。清廷大恐，起“蘇報案”，拘先生於獄者三年，而先生聲名益高矣。時人謂《尙書》、《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及《革命軍》出，人人皆言說革命矣。是先生於晚清思潮中，揚清汰濁，改良思想遂漸爲世棄。先生凡七遭追捕，三入囹圄，革命之志，彌篤不衰。一九〇六年，先生出獄，東渡扶桑，入同盟會，主筆機關報《民報》倡言革命，與康氏一脈相詰難。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潤而投身革命者，豈可數哉！先生又著《俱分進化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論》、《代議然否論》諸文，於革命力量之奮揚、帝制後之國體、建制諸事，皆有學理之探討，即“中華民國”之名亦出於先生。唏！民國之肇興，先生奠基之功鉅矣。其所論說雖未能盡行，然未可輕而忽之也。

民元既始，先生與孫、黃等不無異同，然心志固在匡救時艱，而無錙銖之私也。洪憲竊國，先生復以反袁遭繫，不得出戶者三載，絕食者再，當庭詬詈，耿耿不可屈，而袁氏亦無如之何也。袁氏亡，先生乃得南歸。其時南北紛攘，國猶未安，乃奔走南北，遊說四方，期中華之光復，冀黎民之安康。及國民黨北伐，先生復以政見不合，退隱滬上，弘道一隅，若無與於政，然拳拳之心，固未嘗少懈也。繼而東北兵退，熱河不守，淞滬亟變，先生皆唱大義於天下；責張漢卿，助十九路軍，不廢實行。先生晚節昭昭，絕無纖毫之頹唐焉。

先生之學博而約，閎而邃，於經、史、子、集及印、西諸學皆有獨得。舉凡古近政俗之消長，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

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莫不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觀其會通，窮其指歸。故黃季剛(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闡晉康(唐)之遺緒；博綜兼善，實命世之大儒”，誠不刊之論也。

先生尤精於小學，學者謂為乾嘉正統派之殿軍。清之樸學，自崑山顧氏肇其端，後竟蔚為大國。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沿革地理諸學漸為專門，學者苟通其一，即獲讚嘆，而先生乃能會而通之，上承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懷祖(念孫)、王伯申(引之)、俞曲園(樾)之緒餘；下啓近代各專門學科之興盛。先生好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及繙閱大徐《說文》十數過，的然見語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躡越前人者，於文與字，不駐足於音同義同、音近義通、一聲之轉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進以探其源，即後世所謂以歷時觀念檢視本體也。其於音聲，亦不拘於同、近，創《成均圖》，明言對轉、次對轉、次旁轉，益合於音理及語言實際矣。至於發明孳乳、變易二例，尤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經學之小學，一躍而為獨樹大纛之語言文字學。季剛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黃學派”之綿綿。

先生治經，專尚古文，與康有為相頡頏。破燕齊方士怪迂之談，謂《春秋》乃史家之實錄而非萬世之聖經；《易》明古今之變，史事之情狀見焉；《禮》、《樂》為周室法制，《詩》記列國之政，《書》之為史益莫須辨；孔子刪定六經，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為史家宗主。然亦許孔氏以“變機祥神

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復絕千古”。此其立意有別於康氏，而摧破之功則略同，經學由是而遂失廟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於學術獨立，永葆中國獨有之史學也。先生之治史，繼浙東太沖、二萬一脈，尚博雅，切人事，而於明清異代之際，嘗三致意焉，先生論經史之真意於斯可見矣。

先生亦措意於今所謂哲學者，其論周秦諸子、法相莊周之類是也。先生自叙：“蓋學問以語言爲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爲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故先生不以樸學爲極歸，進而上之，期於哲理之構建有所成就。乃作《齊物論釋》，以釋氏法相之學釋莊生之書，“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自許爲“一字千金”。著《國故論衡》、《檢論》，平章古今學術，如以西方名學解墨，明人性之不離於民族之類，皆能洞幽燭微，臻於圓融超邁之境。先生首唱“文學復古”，實即擬於泰西之文藝復興，而應機說法，“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以周秦九流之學復華夏之舊物，新中華之來日也。

先生之學，淹博閎通，而不能忘情於政治，故少年鍼砭之論，晚乃有駟不及舌之嘆。實則先生光復中華文物之志，條貫始終。晚歲講學吳門，如“子夏居衛，西河於以向學；仲尼反魯，雅頌繇是得職”；匪止此也，乃一則以挽頹風，厲薄俗，取顧寧人知恥、厚重、耿介之說，復揭必信一語，以圖治時人之弊，使人皆得卓立；一則以宣揚國粹，激勵種姓，以文史之學傳中

國之命脈，國即亡而必復。嘗言：

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余講學，未斤斤於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余之志也。

臨終，先生尚以爲飯可以不食，學不可以不講，是先生拯溺救危，以祈斯文不墜於地爲己任，發揚國之瑰寶爲天職，其自任者重矣，遠矣。先生自謂“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斯亦見其終以國運人事爲第一要諦也。

先生講學卅年，門生遍天下，從遊者各得其一體，皆爲名家。承其小學者，黃季剛、錢玄同；繼其史學者，朱希祖、王仲犖；汪旭初以文學顯，吳檢齋以經學鳴。餘者自成一家者更僕難數。先生實亦下啓新文化運動者。健將如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輩，多嘗登章氏之堂或其同道；而其論周秦諸子出於王官，平章歷代學術，實爲近代學術史之濫觴；論有清之學，指斥清廷之桎梏，分吳、皖爲二派，條析古、今之得失，爲總結清學首出之作。其後劉申叔、梁任公、錢賓四等繼之，雖勝義迭出，要皆未能破其樊籬……是先生開啓山林，後來可循道而有所成，其嘉惠於學林後世者，豈可以道里計哉，先生者可謂近代之大師矣！

昔錢玄同輓先生曰：

續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

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
國土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

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
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種姓，
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

是爲得先生學術之精義，顯先生踐行之精神也。

先生之功偉，先生之學精，後之仰之者，有志於爲國爲學者，可不識全豹而言前修耶！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乃有梓行先生《全集》之議，且列入國家古籍出版規劃。上海人民出版社榮膺此任，聚海內英華，句讀校錄，費時多載，乃有《全集》八卷問世。惜非完璧，且囿於時空物力，不免於偶疏。先生文宗魏晉六朝，喜用古字僻典，學人時苦艱晦，難以卒讀，魯迅即嘗言其於《煊書》，“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全集》八卷出，乃得以便人之披覽。近歲先生文字選本漸多，實多本此；學林亦得藉以探賾先生之生平學術及近代之政局、學界之變遷。《全集》之功不可沒也。

雖然，時人亦不能不以《全集》而未全爲憾。先生及門，尚在者無多，前輩學人亦如晨星，董理編校之事，一似救寶物於屋火，豈可稍遲哉？三十年來，學界多措意於先生之事之學，求索所得益富益明，再版《全集》，補其未備，此其時也。是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乃重啓刊行《章太炎全集》之計劃，藉海內外著名教育、研究機構諸公之力，復得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政府勳力褒崇鄉梓先賢，爲之大力襄助，乃有新刊《全集》之剗劂，

後出轉精，必可期也。

昔予從陸宗達(穎明)先生習小學，承章黃一脈，於太炎先生宏論每有會心，獲益良多。迄今六十載，無時不以章、黃及其高足如穎師者之爲學爲人自勵，雖不敢以傳人自矜，要亦繼其志而張大其學。今蒙太炎先生哲孫章君念馳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謬愛，以《全集》之序囑予，憶先哲之諄諄，念來者之嗷嗷，敢不勉而爲之。乃略陳所識先生行事、爲學之衷心，祈於今於後，繼之者當念茲在茲之意，並及《全集》整理出版、再整理再版之始末云。

繫！先生捨身求義於民族危亡、國粹陵替之際，後學拜誦校理則值民族復興、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傳民族命脈，國運必復之論，今也益見其先知矣。傳道於國運轉捩存亡之秋，承前啓後，逝者已矣；繼學於阜平安和之日，改舊立新，其待來者！

許嘉璐肅手謹識

癸巳季冬，值太炎先生冥誕一百四十五週年

前言

章太炎先生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學者。他一生撰著宏富，在哲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醫學、佛學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詣，他的著作已經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文獻，是我國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太炎先生出生在餘杭，這是餘杭人民的驕傲。一直以來，家鄉人民對太炎先生懷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政府多次出資對太炎先生故居進行維修和保護，太炎先生故居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家鄉人民把太炎先生的人生經歷、革命思想和愛國主義情懷編寫成鄉土教材，作為中小學生的必讀課本。逢太炎先生誕辰紀念日，必舉辦各種紀念研討活動。在餘杭以先生別號命名的有太炎中學、太炎小學、太炎路（街）、太炎社區……作為太炎先生家鄉的人民，我們熱切期盼太炎先生的著述能夠系統地整理出版，得以傳世。

二〇一二年八月，太炎先生的嫡孫章念馳先生、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餘杭區政府出於共同的認識和願望，決定合作整理出版《章太

炎全集》。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們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先後多次拜訪了著名學者、九屆和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先生。許嘉璐先生對編纂出版《章太炎全集》非常支持，並欣然接受聘請，出任《章太炎全集》編纂出版學術委員會主任。

作為太炎先生家鄉的人民，這次能與上海人民出版社通力友好合作，為出版《章太炎全集》出一份力，既是餘杭的責任，也是餘杭的光榮。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定會使《章太炎全集》成為學界和出版界公認的太炎先生著述規模最大、收錄文獻最齊、整理校點最精的鴻篇巨著。

中共杭州市餘杭區委員會

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政府

二〇一四年四月

本卷前言

一 同一著作的三次結集

本卷編入了章太炎的同一部著作的三種結集本：《煊書》初刻本，《煊書》重訂本，《檢論》。

章太炎一生中間多次自編選集或文集，第一部自選集便是《煊書》。煊者，迫也，意即“逼迫人有所爲”^①。他自己解釋命名的用意，說本書“速鞠迫言”^②，也正是毫不掩飾地告訴讀者，那裏面輯集着窮蹙的環境迫使他非說不可的話。

所謂窮蹙，當然主要指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尤其指關係着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政治環境。這在《煊書》重訂本的首篇《原學》裏，有清楚的說明。

顯而易見，假如環境起了變化，而作者仍然感覺志不得伸，行不如意，那麼他豈不又會有非說不可的新話要發表嗎？那麼他豈

① 《說文》：“煊，迫也。”段玉裁注：“今俗謂逼迫人有所爲曰煊。”

② 《煊書》初刻本、重訂本日錄後叙。按，鞠有多義。《尚書·盤庚中》“爾惟自鞠自苦”，偽孔傳：“鞠，窮也，言汝爲臣不忠，自取窮苦。”作者當取此義。

不還會對自覺已經過時的老話，乃至膚淺的話，錯誤的話，予以刪除、補充或否定嗎？

於是，我們便可理解，為甚麼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短短十幾年間，章太炎會對這部自選集一再表示不滿意，幾度重訂篇目，調整結構，增刪內容，修改文字，以致結集本有三種之多。

章太炎是近代中國的著名思想家。他曾經把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的歲月，五十歲以前的二十餘年，貢獻給拯救苦難的祖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他參加過戊戌維新，呼喚過辛亥革命，反對過袁世凱竊國。他受過清朝反動政府的追捕，坐過外國侵略當局的監獄，還在自己夢寐以求的民國建立伊始便遭遇過被袁世凱囚禁的折磨。他有過幻想，入過迷津，犯過錯誤，翻過筋斗，經歷過革命的勝利和失敗。他在那些年裏始終處在時代的潮流中，同先進的人們一道活動和思考，用筆和舌從事戰鬥。正是這一切，促使他的思想在實際鬥爭中發展着，變化着。儘管他和他在不同時期的朋友，都以為是自己的觀念改變了世界。然而，從《嘯書》到《檢論》三次結集的過程，其實是他的思想發展反映客觀存在變化的否定的否定的表現，恰好證明馬克思說得對：“觀念性的東西卻不過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了位並且變了形的物質性的東西。”^①

毫無疑問，研究從《嘯書》到《檢論》的結集變化過程，不僅對於瞭解章太炎的思想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是必要的，而且對於近代中

①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郭大力、王亞南譯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XXII 頁。

國的思想界的研究，也有重要參考價值。不消說，從事這樣的工作，起碼條件是有書可讀。但是，《煇書》初刻本早成稀有的書，《檢論》也較難得，並且傳世本都沒有標點，令人艱於閱讀。《煇書》重訂本雖然流傳較廣，最通行的是初版的翻印本和影印本，即有舊式圈點的斷句本，然而正是這個版本錯字最多，斷句也多有訛誤，用時儻不核校，便鬧笑話。

爲了便於讀者索閱，上海人民出版社決定將三種結集本合編爲一卷，並委託我承擔編校標點工作。這使我有機會比較仔細地通觀三次結集的變化過程，實現了由逐篇剖析入手考察從《煇書》到《檢論》所反映的章太炎思想變化過程的宿願，同時也發現了若干流行說法的問題。

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三書所反映的章太炎思想體系的發展過程，包括若干重要論文的基本內容，以往有的概述不正確。對此，姜義華和我合作編注的《章太炎選集》^①已通過若干篇目說明分別指出，茲不贅述。另一方面是關於三次結集具體經過的分別考察，以往有的說法是錯誤的，毛病出在基本事實搞錯了。而這些基本事實，例如結集的時間、修訂的經過、版本的同異等，對於正確說明前面的問題是很要緊的，所以不能不在此略作考訂。

二 《煇書》初刻本

《煇書》初刻本，即木板刊行的第一次結集本，據我所見有兩種傳本，封面都是梁啟超的題簽，字體和版式也都相同。主要區別，

^①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

在於一種僅有目錄所列五十篇^①，另一種則於書尾附有《煊書補佚》，收入《辨氏》、《學隱》二篇，均為目錄所未列，頁碼也另起。

顯然，初刻本至少印行過兩版。前一種當屬初版。以後再版，作者決定增加二篇，因列入目錄和插入正文，都需要動及原版，故以補佚形式附後。儻把補佚本叫做原刊本，並據補佚二篇未入目錄，便斷定全書尚未最後定稿云云，則祇能稱為臆說。

初刻本的兩種版本，都沒有按慣例注明刊印的書坊和時間。那不難理解，因為作者在戊戌政變後一直是清朝官員搜索的一名對象，他的著作在國內當然祇能秘密出版。

不過，初刻本結集完成的時間，是否無從確考呢？不然。作者在目錄後叙中交代得很分明，那是在“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

辛丑，指南明桂王永曆十五年，當公元一六六一年。這一年，桂王政權被清軍攻滅，被章太炎視為奇耻大辱。其“後”，即從壬寅年（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起算，下及第二百三十八年，當為己亥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由於作者用的是夏曆，因而己亥十二月，實當公元一九〇〇年一月底以前。

《章太炎年譜長編》內有關於《煊書》初刻本“輯訂”的時間地點的大段考證，首先斷言目錄後叙所署“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即戊戌十二月，繼而列舉種種材料，證明初刻本由“輯訂”到“付梓”，時間相隔一年，且未最後定稿云云^②。這個考證不足信。毛病就出在

① 此本在復旦大學圖書館有收藏。

② 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册，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六、九五——九九、一四三諸頁。

該編者把“辛丑後”讀作“辛丑起”，以致一字之差，造成結論全錯。

人所共知，按照王朝紀年的慣例，新朝紀年起算的那一年，一般都是舊朝覆亡的後一年。當然也有例外，但章太炎的用法卻在例內。那時他雖然還在“與尊清者游”，卻已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懷着深刻憤懣，以致不願用清朝紀年。他把南明桂王政權滅亡以後的清朝統治，都視為非法，因而使用“辛丑後”紀年，自然不會包括桂王尚存的辛丑年在內，而用“後”字也分明表示是從辛丑的次年算起。

儻說邏輯的論證不足為據，那麼還有無可辯駁的材料作證。它們不在別處，就在《嘯書》初刻本內。

例如第三十四篇《帝韓》，篇內兩次提到一個確定時限：“自永曆喪亡，以至庚子，二百三十有九年”；“永曆既喪”，“貫二百三十九年而諸夏無主”。這裏還可能有疑問嗎？作者明白指出他說的是“主”喪之後的“無主”時間，並且說到確定的下限，“以至庚子”即清光緒二十六年。由此年上推至清康熙元年，即“辛丑後”一年，方可說“貫二百三十九年”。可見，“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決不可能指庚子前二年即戊戌年，而祇可能指庚子前一年即己亥年。^①

① 或謂章太炎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的時間，在壬寅即一九〇二年，可以反證辛丑後二百三十八年即戊戌年。以前我也認為此說有理，但認為章太炎在不同場合使用的明亡紀年自相矛盾。近來再察，則知不然。據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章太炎與支那亡國紀念會》一文所錄章太炎起草的紀念會宣言書，內言“自永曆建元，窮于辛丑。明祚既移……維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可知此乃指“明祚既移”的週年數。週年當由桂王死年計起，至壬寅為二百四十二年。而此書上文說明祚“窮于辛丑”，下文說明祚既移，“元首不知誰氏”，更可證紀年用“辛丑後”，當從清康熙元年開始計算，因此年始可謂君主不知姓甚麼。